



深度

运动之伤：离家出走的年轻人、“被遗弃”的父母和新手“家长”

许多示威者喊她阿妈，她照顾著50多个示威者，年纪最小的14岁，最大的26岁，其中大约20%的人离家出走，还没有小孩的她感觉，自己一下子“多了50多个子女”。

端传媒记者 林可欣 陈倩儿 发自香港 | 2020-01-29



插画：Rosa Lee

15岁的杜启明（化名）和17岁的朋友目前住在一对陌生夫妇的家。“我没有问过他们是做什么工作，他们也很少管我们去哪里，”启明说。为了安全，他和朋友不对任何人透露这房子的地址。每次示威过后，他会先随便找个地方过夜，从不直接回家。

启明是香港反修例运动的示威者，他长得高挑，初次见面的时候显得沉稳，让人误会他早已成年。自2019年6月，除了兼职打工，他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反修例运动，做文宣、协助被捕者、参与示威，越来越少去中学上课，和家人的冲突愈发激烈。到了11月，因为和父母、哥哥无休止的争吵、甚至扭打，启明搬离了从小居住的公屋。

经朋友介绍认识的谢芷筠（化名），很快帮启明找到了一个住所——一对年轻夫妇愿意为示威者提供免费住宿。启明的朋友也因为参与运动和父母闹翻，比启明早一个月搬进这个房子。房子不小，两个年轻人一人一间房，他们轮流做家务，朋友负责洗衣晾衣，他负责收拾、清洁，饿了就去买盒饭或鱼蛋烧卖。

2020年刚过去的年夜饭，启明和一群“手足”一起度过，那是他在示威中认识的朋友，饭后大家一起逛民间举办的年宵市集“和你宵”。过往多年，启明总是跟著父母和亲戚吃年夜饭，但眼下，家人关系支离破碎。启明显得不太在乎。年三十这天，他和父母没有联系，“少了一些东西咯，但也不会很伤感。”



2019年6月12日，警方进行金钟夏慼道的清场行动。摄：林振东/端传媒

突如其来的反修例运动改变、颠覆了许多香港家庭的关系。一批批中学生、大学生投入运动，有家人理解、支持，更多的是不解和强烈反对。于此同时，一些有一定经济能力、支持运动的市民成为年轻示威者的照顾者，他们在运动中被称为“家长”。30多岁的谢芷筠正是其中一员。她对端传媒表示，现在她照顾著50多个示威者，年纪最小的14岁，最大的26岁，其中大约20%的人离家出走。还没有小孩的她感觉，自己一下子“多了50多个子女”。

街头运动燃烧大半年，近月稍有缓息，但其扯开的裂痕和伤口，不见愈合。谢芷筠说：“我觉得对年轻人的影响是会伴随他们整个人生的，就算最后抗争胜利，曾经的伤口永远都是伤口。”

回不了家，不想回家

阿爸就是扮讲道理，讲不过我就说，‘我就是没道理啊，鬼叫你是我的仔啊？’

离家出走之前，杜启明已经过了几个月颠沛流离的生活。

6月底的一天，启明参加完集会回到家，发现铁闸被家人上锁了，钥匙也开不了。自此，每次示威抗议后，他就到不同手足的家中休息，或是订一晚酒店，第二天才看看能否回家。“有人参与示威后，可能有事就马上回家，收好示威用品，冲个凉，什么都不想就睡觉了，但我还要思考可以去哪里避一避。我回不了家。”

启明生在一个基层家庭，父亲是厨师，母亲做兼职零工，家中还有一个哥哥。启明和哥哥读书都不错，中学时启明考上Band One（编按：香港民间分类认为素质较好的中学。）中学，有一段时间，兄弟俩都想著以后报考警察。启明自嘲，以前自己是不问时事和政治的“港猪”，这个词常用来形容政治冷感的香港市民。

6月运动爆发，他经老师介绍，开始关注《逃犯条例》的修订。6月9日，他约上朋友参加游行。12日，大批市民占领金钟立法会一带，尝试阻止修例草案二读，启明下午刚考完试就

赶到现场，夏焯道这时已经人潮涌动，气氛紧张。他不知不觉走到了前线，没有任何社运经验的他，起初还在琢磨进退，不料警察突然大量发射催泪弹。他一身校服，戴著普通口罩，和同伴慌张逃走，一路上看到速龙小队追赶市民，一个体弱的老人被防暴警察推倒在地。

“啊，这真的是我一直以来认识的香港吗？我们的政府这样对市民？”启明回忆，这一天的经历震荡了他。深夜回到家，父母还没休息，他忍不住分享一天的见闻，他认为警方过分使用武器，父母回：“你读书啦！这些关你什么事啊？”

启明没有理会父母，自此天天到立法会煲底参加集会。6月底的一天，放学后，他回家收拾物品，准备再去煲底参加集会，刚想出门，父母突然大骂，“不要出去了，那是废青才会做的，是搞乱香港！”启明说，他起初尝试争辩，父母开始激动动手，母亲抡起一张木凳朝他砸去，哥哥箍住他的颈部，他的手机被父亲摔在地上，一家人扭打在一起。

起初，启明是一个“和理非”，在家附近组织连侬墙，搞社区放映。他不时整晚不回家，彻夜在社区里贴文宣海报，累了就到朋友家睡一会儿，凌晨五点回家洗漱，再赶到学校，趴在桌上补眠。后来，他开始配戴面罩、头盔，走上前线。

在家中，他在社区搞活动的物资和前线装备堆积成山，房间有个两大纸皮箱，塞满上千张文宣。而另一边，父母则直接停了原本每星期200元的零花钱。启明只好找兼职打工，一家支持示威者的茶餐厅雇佣了他做楼面服务员，最忙碌的时期，他一天睡两个小时。

启明说，他最初还是想和父母沟通，母亲比较容易激动，他就去找父亲聊，“阿爸就是扮讲道理，讲不过我就说，‘我就是没道理啊，鬼叫你是我的仔啊？’意思就是我要听他的，”他说，哥哥的立场也是“亲建制”，他在家中感觉被孤立，“他们（父母）会拉著我阿哥说，‘不要像那个废柴一样。’”

离家出走前，启明还是会去参加家族聚会。8月底的一天，亲戚聚会，启明特意提早离开示威现场，来不及换衣服，一身黑衣到了亲戚家。饭桌上，亲戚们看著电视新闻，开始责骂“暴徒”，说“应该开枪啊”。启明忍不住辩论，起初还能讨论几句，有亲戚这时提到堕落身亡的市民梁凌杰，说“佢抵死啦”，启明气得拍桌子，起身走了。9月，爷爷寿宴，启明还是去

了，亲戚们继续谴责“暴徒”，这次启明没有说一句，只是和爷爷说“我吃饱了，不太舒服，先走了”。



2019年9月29日，示威者在金钟焚烧杂物。摄：林振东/端传媒

与激烈的争吵和冲突不同，沈月（化名）选择的是回避。

今年23岁的沈月是大学生，运动爆发的时候，正在欧洲做交换生。尽管知道父母向来不关心社会运动，但她还是发了一些运动文宣给父母看看，结果“被骂了”。父母不知道，在外国的巴士上，她看到反修例运动的第一例自杀新闻，一个人哭了起来。

6月底回到香港，沈月开始投入示威，但不打算告诉父母了。出门前，她撒谎说，去和朋友吃饭。最初，她只参加获警方允许的和平集会和游行，后来决定和朋友一起去警民冲突现场做义务急救员。中学时，她和朋友考得急救员资格。

做急救员要带上大量医疗物品，沈月经常背著沉甸甸的大书包出门，引起了父母的注意，家中的关系愈发紧张。她尝试向父亲解释，示威者使用暴力的原因，父亲说，他认为是“他们（示威者）冲击，警察才会放催泪弹。他们应该让步。”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整天让没有实质权力的人让步？”沈月对父亲说，她还想分享过去多年港人如何争取民主，但父亲不想听了。

在家中，沈月总是一个人躲在房间看直播，不敢开声音。每一次有大型示威，她和朋友一定到场做急救，回到家，她很少和父母分享。

她说，自己不想回家了。

11月中旬，运动再次快速升温，示威者在双十一发起“黎明行动”，透过阻塞交通要道、促成三罢，迫使政府让步。在中大附近的二号桥，示威者往桥下扔杂物，尝试堵塞桥下的吐露港公路，警方来到现场执法，在二号桥一带，示威者与警方连续连日对峙，大批市民和学生担心警察攻入中大校园。

沈月一直在冲突现场。催泪弹在她的脚边、眼罩前炸开，她说，自己第一次感受到距离子弹那么近，第一次需要哮喘药，第一次感受到，有数不尽的伤者在等待救援。她整个人神经紧绷，对讲机一发出声响就会醒。

回到家中，她告诉父亲，她认为自己的同学是抱著必死的心去对抗强权，“他们可以打机、叹冷气，但他们没有这样。他们抱著很大决心，你为什么不理解呢？”

“学生为什么不可以普普通通过日子？”沈月记得，父亲这么说。

香港理工大学很快又爆发激烈警民冲突。**11月17日**夜晚，理大被警方包围，大量市民翌日在油尖旺一带发起行动，希望营救理大内的示威者。沈月的心悬在理大内的朋友，她正准备出门去现场做急救，父亲来阻止：“你又出去啊，你醒下好不好？”

沈月说，这句话刺痛了她。“从一开始我很不满的是，他们觉得我很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很蠢啊，是被人煽动的学生。”她觉得睡著了的其实是父亲，她冲出家门，决定不回去了。

肉麻的亲情，三个独立的个体

我接受他们没想清楚一些事情，也希望帮他们了解自己在想什么。

不少示威者直接叫谢芷筠“阿妈”。

大约去年8月开始，常常参与集会、游行的谢芷筠发现，一些年轻示威者被家里断了零用钱、不够钱吃饭，还有一些被赶出家门。一个14岁的女生说，因为母亲威胁她要报警揭发女儿参与示威，自己离家出走；一个15岁的女生说，回到家就发现所有装备被扔出了家门；有年轻人说，家人四个月没有联络他了。

“相处十几年的亲人突然对我这么差，是很难接受的。”她尝试理解这些年轻人的心理，并用不同的方法支援他们：她家提供紧急的短期借宿；对年龄较大的，协助他们在外租房子；对于十几岁的中学生，帮他们找适合的“寄宿家庭”；对于生活有困难的，会不时提供基本生活费用——她身边有经济能力的朋友，都会捐钱给她，支援示威者。

她帮助的年轻人，从一开始的一两个，到现在的50多个，其中最多的，是像启明一样的、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她观察，许多年轻人在8、9月仍会和父母沟通，但到了11月，经历中

大、理大事件成了转捩点，年轻人负面情绪陡增，出现轻生、憎恶同学、不想再与父母沟通的想法。



2019年8月5日，大埔示威者在催泪烟中。摄：林振东/端传媒

11月开始，她更频繁地与“子女”们见面，罢工十几天，每星期花上见三、四天见年轻人，了解他们日常生活，也和他们讨论运动策略，例如某些暴力使用的原则，“核爆都不割”（编按：反修例运动口号，意指无论发生什么，和理非和勇武派都不会切割）的口号是否合理。

“现在十几岁的孩子已经需要面对很多社会问题。我接受他们没想清楚一些事情，也希望帮他们了解自己在想什么。”谢芷筠说，自己作为成年人，能消化情绪，而十几岁的示威者，未必如此。

在不少年轻人看来，尽管谢芷筠还没有生儿育女，却是一个颇模范的母亲角色。不过，启明从来不会叫谢芷筠“妈咪”或“阿妈”，最多只是叫“姐姐”。和启明说起家人或亲情，他总是说，“哎呀，好肉麻！”

回想自己的成长经历，启明说自己一直不太喜欢父母。他说父母的沟通方式总是“否定”或打骂，即使是反修例运动之前，他也常常和母亲吵架，一言不合，母亲就出手推撞他。与哥哥相比，自己似乎没有那么得到喜爱，尽管“小学的时候我读书更好，我考到BAND ONE，阿哥没有考到。”

小学时，有一次与母亲去干妈家作客。他一个人在阳台上塞著耳机玩游戏，音乐恰好停了，他听到妈妈说，生他“是一个意外”。他一直记得这件事，但他说自己不太在意。

运动之初，谢芷筠常常收到启明的短信，“有时是父母又骂他了，有时是他与阿哥又打架了。”谢芷筠说，他总是一副不太在乎家人的样子，但她心想，“不介意也不会总是提起这些事。他不会讲自己伤心，只是说他们又衰了。”

接触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谢芷筠发现，每一个家庭背后，都藏著独特而复杂的故事。

理大战事之后，沈月就没有回过家，暂住同学家。父母不停打给她，她不接，随后她回听留言，大多是责骂。

“我这样离开，我是不是真的完全错了，是不是有问题呢？”沈月说，“我都会想（自己）是不是很差，很自我中心，但我也都很诚实，我真的不想回去。”

她观察自己暂住的同学家，那位母亲很支持年轻人参与运动，同学和家人可以轻松说自己出去参加什么活动，她很羡慕；而回想自己家庭，她想起一家人总是一起吃饭、看电视，但彼此好像都不太了解对方。

离家两个星期后，沈月冷静了一些，决定写一封长信，Whatspp发给父亲。她告诉父亲这半年多来的亲身经历，也摊开了父母不曾捕捉的一面——因为在家里感到压抑，她曾经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

“一切安好，勿念。如果只是想和好，暂时不要打电话给我了。我不想留在家里，每天都觉得好辛苦……自7月以来已经这样，我也见过好几次情绪辅导了。”沈月在信的开首写道：“我好肯定每次都有听你的说话，我每次都会解释、告诉你发生什么事，但你们似乎总是只是在重复自己的话，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因为你们年轻过，所以总以为了解我所想的，但我们毕竟出生在不同环境，受不同教育，说到底我们是三个不同的个体，没有人可以完全清楚对方的感受……如果你们只是要和好，那就不要打来了。我从小到大都很孤独，不是因为我没有兄弟姐妹，是因为没有一个地方真正接纳我，重视我所重视的价值的地方……”

父亲的回信

我想这些对于日后想像的不同，是他们之间有张力的原因之一。

电话的另一边，沈月的父亲告诉弟弟，女儿离家，他感觉“自己好像被遗弃了”。

沈月父亲是一个服装打版师傅，娶了内地太太，沈月小时候在内地度过，直到小学时，才和妈妈一起来到香港。面对突如其来的浩大运动，叔叔说，两代人“想到的场景不同，想像的未来也不同”。

沈月叔叔分享，沈月父母期盼女儿大学毕业后，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不要赚大钱和出人头地”，最重要是“健康、稳定”。在父母的想像里，参与运动会带来被捕，“父母想得好差，‘没有啦，被捕就一辈子都翻不到身。’”而另一边，叔叔曾经问沈月，快毕业了，对前途是否担心，沈月却觉得，“天空海阔，东家不打打西家”，生活怎么也可以搞得定。



2019年11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学二号桥，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摄：林振东/端传媒

“我想这些对于日后想像的不同，是他们之间有张力的原因之一。”叔叔今年50岁，政见一直亲泛民主派，每年七一都参加大游行。2019年七一游行，叔叔也参加了，游行后他没有马上离开，而是走到立法会附近，去看看大批包围立法会并尝试冲击的示威者在做什么，在现场亲身感受，他觉得年轻人有组织、有部署，“想过前前后后好多事”。

家庭聚会上，叔叔会和沈月聊天，也尝试做她和父母的缓冲带。在叔叔心中，沈月在同龄人中是成熟的孩子，对于自己在运动中的位置，是考虑过的。

沈月搬出去住之后，叔叔为哥嫂安排了一场小型聚会，介绍他们认识教会中的朋友。聚会中，不少家庭中都有20岁出头、参与运动的年轻人。叔叔想让沈月父母了解，其他爸妈怎样与孩子相处。

这似乎颇有成效。收到沈月发来的长信后，父亲也仔细打了一大段字，发出去之前还特意先发给弟弟看。字里行间，叔叔觉得沈父多了表达感受，而非一味训话。

“阿女，前几日你的留言我已反复读了多遍，相信我不会误解你的想法。”父亲在回信中写道：“其实在目前世界大环境而影响小环境下，年轻人对社会有著一番包袱我是理解的，你参与其中亦无可厚非..... 在言谈间无论我或你母亲的语言修饰可能有些不理想，然，其出发点均基于善意，并无半点加害于你之心。而听后不合你意便不辞而去，一走了之，此举实令父母心理有点伤痛，兼有被遗弃之感！..... 你虽已成年，学历高，见识广，但父母的心态始终离不开中国的一句老话：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 我不能预知以上所言会对你产生何种反应，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

收到父亲的长信息后，沈月回家收拾了两次东西。聊起天，她和家人还是会争吵、哭泣。

离家后，启明很少收到家人的联络，偶尔有，也是一顿乱骂。“我没有返学，老师去找他们，他们就打来骂我，骂什么都有，”他说得轻松。

过去一段时间，他也多了和朋友交流各自家庭的问题。“以前我真的以为我家庭这样挺正常的，但后来和朋友聊多了才发现，（我的家庭）真的不太正常，”他说，他知道身边不少手

足，即使和父母政见不合，但家人还是会给予一定程度的关心和支持。

现在和他一起住的17岁的朋友，离家以后，朋友的妈妈就心软了，不时打电话给儿子：“你不回来都不要紧，一个月回来吃一两次饭啦，让我们看看你！”

问启明怎么看？他还是连连摆手，一脸嫌弃，“好肉麻啊！”过一阵子才认真道：

“比我（的家庭）好咯，但没办法羡慕，十几年都是这样过来。一个精神病不会觉得自己有精神病。”

遗弃所带来的创伤

我觉得我长大后都不会理他们了，顶多食餐饭..... 但无论如何都要养他们吧。

香港社工、美国创伤压力专家学会专家委员赵盈恩，过去十多年一直从事创伤介入。反修例运动爆发以来，她一直关注社区创伤（Community Trauma）。在她看来，这种“创伤”首先源于政府带头做起的“遗弃”行动。

在不同场合，特首林郑月娥多番强调要与“暴徒”割席，美心集团创办人长女伍淑清亦称要放弃与年轻人，在赵盈恩看来，割席意味著一种放弃、遗弃，会给人与人的关系带来创伤：“遗弃会带来一种创伤，为什么要放弃年轻人呢？屋企人（家人）是不是真的想放弃他们呢？”

赵盈恩说，遗憾的是，在华人文化中，人们往往口是心非，沟通不良。“明明儿子跌倒，心都痛到死，但都要骂，活该啦这么笨！”她去中学和大专院校作培训，听到不少家长的声音。有家长说：“我叫小孩不要听那些人的，多花些心思在学业上。”

“妈妈这么说，对话就完了啦，小朋友也不会再说什么。”赵盈恩分析，这等于关闭了沟通的门，“谁可以帮小朋友调节情绪呢？”

今年1月10日，港大医学院在国际医疗期刊《刺针》刊登研究报告，指出反修例运动期间，每5名港人中有一人患疑似抑郁症或怀疑创伤后压力症（PTSD）。这项研究只涵盖18岁以上的市民，在2019年6月至9月社会震荡时期展开。研究显示，家庭支援有助于缓解抑郁情绪。

赵盈恩说，对每个个体，引发PTSD的危机事件都不同，“比如年轻人出街，被警察打，可能未必是会令他受到精神创伤的事，因为可能预想到了，但回到家，被阿爸赶出街，那一刻可能才是危机事件。”

而换一个角度看，父母愤怒的背后也藏著创伤，只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会觉得，我自己很失败，不懂得教小孩，为什么我养了他这么多年，他完全不听我的话，在外面好像第二个人。”赵盈恩说，这样的父母常常经历背叛、无助、愤怒等情绪。

谢芷筠说，她的“仔女”中，有少数人最后和家人和解了。一个15岁的女孩，被家人赶出门，在她家暂住一阵子后，回家拿东西，谢芷筠鼓励女孩和家人谈谈。“死了，（家人）好像想锁住我。”女孩到家后，谢芷筠收到消息，她安抚女孩冷静下来，又过了两小时，女孩发信息说，家人不再阻止她参与示威活动，只是要求她每晚都回家。但也有许多人，始终无法和家人好好相处，谢芷筠说，那不如分开住，不时回去吃饭。

沈月今年要毕业了，她不打算再搬回家，不过春节时回家吃了两顿饭。离家出走后，她辗转住过同学家、大学宿舍和酒店，换了至少五个地方。与忧心忡忡的父母相比，她感觉社会上还有许多空间让她去做想做的事。她计划著，毕业后做一名记者。在她的叔叔看来，香港人一直很少将政治议题带入家庭，面对浩大的政治运动，不少家庭关系都受到前所未有的伤害，而如何与年轻人沟通，是许多香港人未来都要学习的。

什么才是真正“屋企人”？杜启明不假思索地回答，“首先要是关心我的，不是做什么骂我，而且现在要加进去的标准是，一定要是‘黄’的。”

现在，他原来的家里已经没有留什么东西，“什么都搬出来了，除了书”。他不认为自己和家人未来的关系可以修复，可能就是这样一路僵持著。

“我觉得我长大后都不会理他们了，顶多食餐饭，”他说，“但无论如何都要养他们吧，如果他们没钱吃饭。”

运动走过七个月，看著身边越来越多人被捕，启明也开始思考自己的前路。“之前完全不会认真去想，自己有什么得著。之前只是觉得，香港人会赢。”启明说，“现在有些累了。现在我依然有那份信念，但我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可能自己不会有好结果。”

这个农历新年前，未成年的他需要办理一些手续，必须要找父母签名。他硬著头皮，约母亲出来吃饭。

他想找一家“黄店”，即支持示威者的餐厅，但连续找了五家都要排长队，最后只好随便找家面馆安顿下来。两人面对面，母亲不多话，只是帮杜启明签了名。后来启明又回家收拾生活用品，那一次，启明感觉，父母少了责骂，只是让他为前途与未来多考虑一些。他们心里突然感觉有点不一样，“感觉不那么讨厌了。”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杜启明、沈月、谢芷筠均为化名。）

（端传媒实习记者梁中胜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逃犯条例



邀請好友加入端會員
成功訂閱同享優惠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八问“2019新型冠状病毒”：如何传播、怎样医治，和SARS有什么不同？
2. 确诊名单外的死亡患者
3. 台湾口罩去哪儿？为何台湾政府全面禁止出口？
4. 武汉封城记：“一夜之间就慌了”
5. 疫情与舆情十七年：被瞒报的SARS与被孤立的武汉
6. 疫情与体制：高效的“中国模式”，为何总是在公卫危机上重蹈覆辙？
7. 泛科学：三篇最新的新冠肺炎相关论文，都讲了什么？
8. 武汉疫情：封城是最好的办法吗？
9. 1.28疫情更新：内地停发港澳个人游签证，香港周四起暂关闭西九龙等站、香港往来内地...
10. 从SARS到新冠肺炎，台湾因“一个中国”原则被拒于WHO门外再度成为话题

编辑推荐

1. 无法抵达的物资：民间救援为何迟迟送不到一线医生手上？
2. 回顾：英国退欧背后的本土政治演变
3. 香港口罩去哪儿？四问进口受阻、储存机制和监管缺口
4. 运动之伤：离家出走的年轻人、“被遗弃”的父母和新手“家长”
5. “封关”还是“罢工”？香港政府的防疫策略与信任危机
6. 许崇铭：防疫中的“陆生返台政策”，为何令人忧虑？如何改善？
7. 返台陆生健康管理争议：究竟发生什么事？
8. 影像：人人防疫，肺炎阴影下的香港新春

9. 台湾口罩去哪儿？为何台湾政府全面禁止出口？

10. 李子：“华人、中国人、武汉人”——疾病中的集体污名与社会矛盾

延伸阅读

“封关”还是“罢工”？香港政府的防疫策略与信任危机

医护罢工的背后，是对整个政府的彻底不信任。如此严重的信任危机若不得到即刻回应，必将给香港此次防疫的前景蒙上一层阴影。

专访钟庭耀：香港民意调查可能在经历灭声的过程

“可能有一些保守人士觉得，如果大学界里面没了民意调查，就能六根清净。”

大检控是“依法治港”抑或司法灾难？——专访大律师吴靄仪

在吴靄仪看来，政府和警方手持遗留自殖民时期的法律，大规模拘捕，而原本应独立决定检控的律政司把关不力，最终，压力将慢慢全部过渡到法庭，未来数年，香港将出现“一场无法估算影响的司法灾难”。

未成年抗争：他们最漫长的暑假

他们十五、六岁，走上街头，也将朋辈、父母、老师、校长带动起来。这个暑假，“一起成长吧，整个家庭”。